

绪 论

一、人类文化创造活动与价值观的关系

从 16 世纪至今 作为人类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社会变革的现代化,^①已势不可挡地成为席卷全球的发展潮流。这潮流的源头大致流淌于 16 世纪英国农村经济经由圈地运动向资本主义的转型 至 19 世纪在西欧北美汇成汹涌澎湃之大潮。20 世纪以后 随着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节节胜利,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 出于民族独立强盛的渴求 为在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以彻底摆脱被动挨打的落后局面,亦无一例外地将现代化视为发展目标和价值取向,发达国家则以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它们的社会体系为前提,采取新殖民主义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所谓“外源性”^②现代化予以鼓励。于是,大风起兮云飞扬,五洲鼓荡兮排巨浪,现代化大潮遂以铺天盖地之势,涌向全球。尽管道路方式因国因地而异,但其实质性内容则是一致的,即在世界范围内,告别传统的农业文明,而由现代工业文明取而代之,并且现在已在向信息文明进军。

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 由前现代向现代演进 作为人类

^① 美国历史学家布赖克(Black)认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能够与今天的社会现代化相提并论的社会变革,只有两次,一次是人类的诞生,另一次是文明的出现,而社会现代化则是人类历史上第三次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② 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的尹保云在其所著《现代化通病》一书中称“西欧现代化是‘内生性的’即有着自下而上的自然发育过程 而迟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外源性的’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现代性的渗透或压力)。”

文明发展逻辑的必然趋势，现代化历史进程无疑凝结着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在这一进程中，人类的生产、交往、思维能力极大提高，并取得了前现代无可比拟的巨大文化成果。首先是经济领域成就辉煌：自工业革命迄今二百余年来，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突飞猛进，高新科技层出不穷；交往交通方式日新月异，社会财富空前增长，生活质量、标准不断提高。与经济领域需求与满足需求能力的大幅度生长相伴随，社会结构、文化形态与价值观念亦在快速转换：以血缘为轴心、凭出身门第论贵贱的部落和封建传统土崩瓦解，社会结构按生产和效率及消费、福利最大化原则，从产业、就业、人口、城乡等各层面进行着重组。个体的自由与价值在业绩与地位相随的格局中被强化，人类的威力与自信伴随核能、航天、计算机网络信息与生物工程的发展与应用而被膨胀。挺拔的人性不仅压倒了渺茫的神性，而且以“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气势挑战自然，驰骋宇宙。

然而，由于客体的无限性和人类认知实践能力有限性的先天矛盾，由于人类自身分裂所造成的主体内部的后天冲突，从人类整体存在的高度看，现代化进程和有史以来人类各阶段的历史演进一样，总是呈现出福祸相依利害相随的格局。而且，现代化进程所特有的为赢得高速发展而淡漠人情傲视自然，对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工具理性的高扬，还使得这种如影随形的利害两重性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不仅在大致已完成现代化的西方社会，已普遍地感受到了现代化负面效应的强大压力，就是在奋起直追的发展中国家，亦已在初步品味现代化甘果的同时，尝到了其中夹带的诸多苦涩。因而，四海之内有识之士皆在惊呼：现代化其实是一把双刃剑，既为人类带来福祉，也给社会设下陷阱。福祉是不能放弃的，而陷阱却需要尽可能防避。于是，使命感和责任感促使文化界开始从各方面探索应对现代化过程负面效应的方案。

所谓负面效应，即是人类活动及其产物所构成的宏观反主体效应，即与主体根本和长远利益相悖的后果。而历史和经验证明，

人类所从事的任何活动，包括现代化过程中所作所为，无不受实践主体所持的价值观的左右。即是说，主体的价值向度是其活动及产物的支配性力量。德国的沃尔夫冈·查普夫在其《现代化与社会转型》一书中坦言：“现代性是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结果，是新制度和新的价值观念的化身。”^①因而，若想防备和减少现代化进程中的负面效应，人类首先需要对自身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追求进行反思和清理，并根据主体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及时有效地对其加以调整，如此，庶几可以最小代价摘取现代文明之果，并为人类向更高阶段迈进也即所谓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何以说人类的活动是受其价值观所支配的？支撑着西方发达国家所谓内生性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主要是什么？为什么说现代化的许多负面效应与其背后的价值向度有直接关联？对此，我们可作如下的扼要分析和说明。

众所周知，作为地球生物中一个极特殊的种类——人，既是自然生物，也是文化生物，或曰是二者的统一。人特殊于、也是高于其他任何地球生物的本质力量，就在于它的生存和发展，不是依赖于出自种属遗传本能的对现成自然物的有限和定向摄取，而是依赖于根据自身需求和需求的发展，经由个体组成的社会，在不断认识自然（包括对象世界和主体自身）的基础上，对自然的不断利用、加工、改造的文化创造活动。文化创造活动的结果——即人通过生产生活实践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经由人所独具的纵向和横向的社会交往活动，不但能世代相传和向不同地域扩散，而且处于永无休止的发展过程中。人的这种社会文化创造活动过程和成果的延续及发展，也就构成了人类特殊于其他生物的社会历史。换言之，人的活动和历史是自然历史过程和文化创造过程的统一。而作为人的本质特征的文化创造活动，总是首先受人所特有的、以意识表现出来的、反映其客观需求和主观愿望的、带有自我评价色彩

①《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62页。

的目的性驱使的。这种意识和目的性用哲学的语言来概括 就叫做价值观。

“价值观”在中国人的原生话语系统中 本不这样表达 而是叫“求”、“原”、“图”等反映主体关于人生理念和追求的一类词语。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西方人的一些哲学概念逐渐进入了中国人的思维和语言系统。于是，价值、价值观，不知不觉成了大众的常用词。据笔者所知 哲学界谈论的价值，一般是从主客体的关系入手，指的是客体由于主体的实践活动而产生的满足主体需求的效用，或曰价值关系。而价值观则应是主体对与其发生关系的诸多价值的评价和选择。又因主体的存在方式是诸多个体按一定社会关系组合而成的群体，因此，通常所说的价值观，系指被特定时空下特定群体所共同认可、并从总体上影响着该群体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趋势的价值取向。

那么，这种价值取向或曰价值观是怎样形成的呢？历史地看，一定主体的价值选择，在其初始阶段，应该说只不过出于一种求生本能，在其所处客观环境允许的条件下，谋取什么和怎样做最能满足其求生本能，主体就会选择什么。这初始的选择过程本身乃是一种原发性的生产和生活实践过程，这时主体所依凭的乃是自身的直接体验，或曰直觉。当这样的体验或直觉经过无数次重复被证明符合主体的根本需要时，就会上升为经验习惯，并渐渐稳定下来。然后，随着主体生产生活实践的发展，这些被积累的经验习惯便会慢慢地形成一种影响后来的实践活动的思维定势、倾向和行为范式。而这些思维定势和行为范式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不仅基于主体实践活动的千百次反复验证被确认为可取，而且还逐渐加进了主体基于故有的实践和现实需求所产生的一些理想和愿望。这样，故有的实践体验，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需求及对未来的希冀 就构成了特定时空特定群体进行价值选择的依据。被选择、被确认下来的价值和价值理想 再经由该群体思想界的提炼与升华 上升为一定的理论形态，并据此理论再返回到对主体生产和生活实践的

指导，该群体价值观就完成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完整发育过程。所谓的价值观，作为人们指导其文化创造活动、判断其所思所为利弊得失和是非善恶的一种评价和选择标准，就是这样形成的。也就是说，生存本能、实践筛选、历史与现实需求、对未来向往的理想愿望、理论思维，是合成特定时空特定主体价值观的五大要素。其中，本能和实践是本源，需求和理想是动力，而理论思维是催化剂和提炼术。几种要素缺一不可，相互作用，推动着特定群体价值观的“成”与“化”。

一般而言，上升为理论形态的价值观，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理智与欲望等诸多层面，都提炼有相应的价值原则。这些在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也即满足主体需求的最一般也是最根本的领域被选定的价值原则，相互关联，构成为一个价值体系。当我们泛指价值观时，实际上就是在指一个价值体系。一定的价值体系总是包含着价值主体——特定时空下的特定群体对自然、社会、个体乃至人类根本或长远需求的独特体认和关怀，凝聚着该群体经验和智慧的精华。作为一定群体对人间是非、善恶、美丑、智愚的选择评价标准，一定的（也是该群体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总是范导着一定群体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也即广义文化创造活动，自然也就范导着不同时空下不同群体的文明走向。

二、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负面效应及其背后的价值向度

由于人的存在既是个体与社会的统一，又是自然与文化的统一，人的需求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所以，无论何种价值体系或曰价值观，其所涵纳的价值原则也必然是围绕着如何对待自我（即个人潜能相对于个体自身、社会、类的需求的展示与发挥）如何对待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如何对待个体与社会即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如何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对待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

这样五组内容而设定和展开的。据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的看法，“个人与群体的关系问题 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问题 是价值观的核心问题”。^①那么，具体到支撑发达国家原生性现代化进程，推动了现代西方文明的价值体系来说，有些什么特点呢？尤其是在作为价值观核心问题的群己关系和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方面，其价值原则又如何呢？

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近代资本主义的价值原则，是人能够而且必须全面探索与征服利用自然。正如马克思所深刻观察和揭示的，资本“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②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认为是自为的力量”^③。在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上，都还没有达到这一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用人工兴建大规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征服自然力”^④，是资本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的必要条件和强烈需求。所以，“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另一方面也创造出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这种体系要求人们“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从而促进了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巨大发展，亦即工具理性的巨大发展，使人类的文化创造活动得以从根本上摆脱了前资本主义时期不得不接受的自然局限性。故而发展工具理性，征服自然，这不仅是一切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资本摆脱生产的自然局限性以后所发挥的“伟大文明作用”。

① 《文化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页。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文化学家E. T. 霍尔在其所著《超越文化》的导论中也表达了相类似的看法。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上），第103-105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上），第392-393页。

④ 参见《资本论》第一卷，第561页。

在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上，推动西方现代化的价值原则是 15 世纪以后在复杂的历史因素的合力下，被逐渐高扬起来的个人主义。这一点是所有研究现代化理论的学者所公认的。曾任德国社会学学会主席、并长期担任在国际学说界享有盛名的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的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查普夫教授在其《现代化与社会转型》一书中直言：“现代性是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结果，是新制度和新的价值观念的化身”建立在私人的和公共的保障基础之上的“个人主义化是现代主义的前提之一”。^① 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用五对变项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行动系统进行了比较，其中第一项就是行为出发点即所谓选择取向。在传统社会是以“无私”为特征的“团体取向”而现代社会则是以自利为特征的“个人利益取向”。^② 《现代化通病》一书的作者、中国研究现代化理论的先驱罗荣渠先生的弟子、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尹保云博士在分析中国秦汉以后直至明清缺乏向现代化转型的条件时，从反面肯定了西方之所以能率先进入现代化的一个主要条件，就是具有“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并解释说：“这里所说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与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是不同的，它既是一种‘社会理论’又是一种‘政治行为规范’，它强调用契约和法律体系来保障个人选择自己的生活，尊重个人财富、自由或社会个性，而不是让统治者来安排人民的生活与平等。”^③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托马斯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亦将现代化所必须具备的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归之于“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制度”，^④ 而政府不过是受雇于作为纳税人的个体和组织、为他们提供公正而有效的法律和政治保障

参考《现代化与社会转型》中译本 第 62-67页。

② (美) 塔尔科特·帕森斯、尼尔·斯梅尔瑟著《经济与社会》第 32-35 页。

③ 《现代化通病》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295 页。

④ 《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1-6 页。

的社会机构。

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上，对西方现代化起着实质性推动作用的，显然是对财富和以其为基础的物质生活的高度肯定与执著追求，而物质生活的富裕也确系西方现代文明最为显著的标志。道格拉斯说：“西方人的富裕是一种新的和独有的现象。在过去几个世纪 西方人已经冲破了赤贫和饥饿困扰的社会束缚 实现了只有相对丰裕才可能达到的生活质量。”^① 笔者接触过的从西欧美回来的人谈起对西方文明的第一印象也总是说“他们太富了”。而富有这一文化成就与资本主义的价值追求完全合辙。德国的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这样形容 15 世纪宗教改革后在西欧逐渐形成的一种道德观念：“这种伦理所宣扬的至善——尽可能地多挣钱，是和那种严格避免任何本能冲动享受生活结合在一起的……这种至善被如此单纯的认为是目的本身……人竟被赚钱动机所左右，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这种对我们所认为的自然关系的颠倒，从一种素朴的观点来看，是极其非理性的，但它却显然是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② 也就是说 把赚钱看做是人人都必须追求的自身目的 是一种光荣的“职业”是光耀上帝、肯定上帝对其恩典、证明自己确系上帝选民的一种“天职”。而在履行这种天职时 又表现出一种特有的理性。首先是理性化的求财方法 如使用更有效的会计制度 私有财产与公司财产之间相互独立，对先进技术与手段和科学发明创造的积极利用 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组织的支持。还包括理性化的财富观念 如从上帝选民的责任感出发 终身贪婪地拼命赚钱 为此敢作敢为 不惧艰难 但又以禁欲式的超功利的态度对待财富 精打细算 尽量节省 把恣意挥霍金钱、用金钱购买享乐看做罪恶 从而使财富得以大量积累起来而成为巨额资本。这种理性化的求财

厉以平等译：《西方世界的兴起》 华夏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5 页。

②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三联书店 1987 年版 第 37 页。

方法和对待财富的态度，被韦伯称之为标准的“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并认为惟有这种精神，才造就了西方率先进入现代文明的文化基础。

总之，崇尚征服自然、崇尚个人主义、以发财致富为天职和荣耀，乃是支撑现代发达国家亦即资本主义世界率先步入现代化的一些主要价值原则（当然还有许多复杂的历史因素在同时起作用）。在这些价值原则的范导下，确实给西方国家带来了前已述及的、以生产力高度发达、国际交往迅速扩大、社会财富空前增长为标志的富裕和文明。但是，不容否认的是，与其富裕和文明共生的许多负面文化效应亦与这些价值观的范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这种共生性及其背后的价值向度，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几乎以相通的面貌在显现着，故而更加令人关注。对此不少关心人类整体前景的海内外学者已进行了大量研究，并且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见解，我们不妨亦在此围绕主题稍加勾勒。

迄今为止，世界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亦即宏观反主体效应，可从客体 and 主体两大系列去观察。客体系列主要表现为现代化过程中，由于只顾及征服利用自然而忽略人与自然的和谐所造成的业已影响到人类生存根基的全球性生态失衡（此方面内容因非本书所论主题暂略不论）主体系列表现于社会层面的主要是动摇甚至瓦解社会整合与发展所需要的理想、秩序、道德的各种矛盾与冲突；表现于个体层面的，则是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相悖的、在人与劳动、人与人、个体与整体和类这样一些体现人类特殊本质的一系列关系上的“异化”现象以新的形式的加剧。

如果说自然是人类的母亲，那么，社会则是人类在自然界之外谋取生存和发展的另一根本性依附场所，它伴随人类始终，是人类借以从动物界提升出来并一步步从自在走向自由的生存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内部结构、运行机制、变迁走向，反映着同期人类物质生产活动能力和精神文化的发展水平。具体到不同时空不同区域和民族的共同体来说，社会系统的变化又总是受该共同体自身

的文化积累和其与别的共同体交往结果的制约和影响。人类的整体性本质，从不同区域和民族在大体相同的物质生产水平条件下，社会形态的大体一致性，得到反映和确认，而相同社会形态下不同区域和民族文化面貌的千姿百态，又反映了人类文化创造条件和能力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前现代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不同时空的任一共同体的发展变化，虽然也不断以各种方式受到其他共同体的影响甚至干预，但基于物质生产水平的限制、交通与通讯等诸多不便，从世界范围看，不同共同体的发展变化，包括相应的社会问题和危机，主要地还是受自身文化积淀的影响，彼此的联系和制约虽起作用，但要么是区域性的、要么是特殊时段内的。比如某一强国在一段时间内可通过军事和政治的手段，对其入侵、占领的地区和势力范围内的原共同体 强行施加诸如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像波斯帝国、中华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廷帝国、查理曼大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大帝国、沙俄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曾经做过和做到的。可是，除中华帝国、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外，那些不可一世的强国大都骤兴骤衰，因而不可能将其原发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模式，向其征服和势力范围地带推而广之。即便是兴起于文明中心的中华帝国、西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尤其是后两者，其文化模式在帝国崩溃和灭亡后，亦随即被后来者、胜利者所取代。就是文化辐射能力范围广阔又极具持久性的中华帝国，亦只是在其文化圈内起过作用。总之，纵观前现代的国际文化融合交流史，可以认定，没有哪一种文明能发展成为世界性的文明或产生过全球性影响，所有不可一世的大帝国都不曾达到这等境况。可是 源于西方的现代化潮流 却是人类有史以来的例外，它以经济领域的工具理性及其在政治、文化领域的延伸和相应的巨大文明成果，使世界英雄竞折腰。尤其是二战以来，世界各国都在以各种方式争先恐后地向现代化进军，而不管自身是否受过现代文明的欺凌。于是 本来在历史上因地区、民族、历史文化的区别而在相应共同体内遭遇着不同社会问题和危机的世界，由于现代化走

向的全球性和内涵的大体一致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间交往的日趋频繁，随着整个世界不可逆转地日益形成一个互相关联的社会大系统，便产生了其表象和本质都呈现出全球性和一致性的现代社会问题和危机，并且发展下去势必会影响全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具体而言，这方面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数端：

其一，世界性的经济增长危机。经济活动是社会用以维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主要活动。近现代以来，似乎全世界都悟出了一个理 不论国家、民族 或任何一级的社会群体 如果缺乏经济实力，就谈不到独立富强和发展。于是，尤其是二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都在拼命追逐以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同时增加为内容的经济增长。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种增长热达到高潮，但进入 70 年代 旋即出现了“停滞膨胀”的所谓“滞胀”局面。1972 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罗马俱乐部成员米都斯等人针对这种现实，出版了对传统增长模式提出警告的名著——《增长的极限》^①在书中指出：“如果目前世界人口、工业化、环境、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的势头继续不变的话，在一百年内的某一时间内，地球上的增长即将达到极限，其结果很可能是在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两方面遭到非常突然和不可控制的衰落。”而且他们还通过对影响传统增长模式五大要素——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相互关系中指数和变量的分析 断言 由于人口增长引起粮食需求的增长和经济增长将引起不可再生资源耗竭速度的加快和环境污染程度的加深，在 2100 年到来之前，人类社会就会因经济增长达到极限而走向崩溃。当然 米都斯等人的说法有些耸人听闻，但它对西方社会即所谓内生性现代化国家经济增长危机现实的暴露及其负面前景的担忧，对人们却有着振聋发聩的作

^① 罗马俱乐部系专门研究未来人类各种危机的国际未来学组织，成立于 1968 年 主席为奥尔利钦贝恰，《增长的极限》是其第一个研究报告。

用。此后 国际经济学界通过讨论 逐渐达成了如果不改变传统经济增长模式, 势必带来因经济增长而导致发展障碍的所谓“无发展的增长”的消极后果的共识,“可持续发展”战略由此应运而生。在西方社会面对“滞胀”发出一片寻找对策的聒噪声中, 许多发展中国家即所谓外源性现代国家, 也同时在经历着因发展经济的努力而遭遇的危机。而且 更为严重的是 这里的危机从性质、范畴到程度, 无一不受发达国家的支配和传染。首先是各种有别于传统的新兴产业部门及其相应技术, 大多来自西方, 在应用相同技术生产相同产品的同时, 自然也产生着诸如环境污染等相同的问题; 其次是发达国家为保护自身利益, 利用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渴求, 采用新殖民主义手法, 以经济合作和援助为名, 故意把一些高污染、高耗资、高耗能的产业转移到穷国; 再有, 就是发达国家在自身经济“滞胀”期资本和需求的自然萎缩 在国际“合作”普遍发展的今天, 给发展中国家所必然带来的诸如国际收支危机一类外部冲击。如此种种, 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现代化的追求中, 始终处于一种举步维艰的两难境地 不发展 就得固守贫穷、落后挨打 而要发展, 一方面在现代化所造就的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现实条件下, 无法摆脱发达国家左右、干扰的阴影, 另一方面, 受本身自然和文化条件的限制, 在必须经历的社会转型中, 需要付出社会与文化的高昂代价。于是, 现代经济走向和行为的全球性和一体性, 就使得二战以来的世界, 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 都在经受着围绕经济增长而出现的现代社会危机。当然 虽说都属现代化的负面效应 两者却不能完全相提并论。因为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 面对增长的危机 需要解决的是如何使业已绽开的现代文明之花在理性的指导下得以青春永驻的问题 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需要努力的仅仅是如何使正在培育中的现代文明之树能够经得起风吹雨打, 如期如愿开花结果的事。不过 尽管层次有别 但却互相关联 且同出一辙 皆现代化带给社会发展与进步中的干扰。

其二 连锁性的世界利益分配失衡及其现实和潜在后果。迄今

为止，人类赖以休养生息发展的共同体最高形式，乃是国家。换言之，国家乃是至今人类社会最高层次的稳定存在。国与国的联合体诸如欧盟、独联体、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仅是在某项或某几项利益关系上采取些协调行动，与作为稳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国家殊难同日而语。前现代时期国家这一共同体的发展如我们前已述及的，主要的是受本身自然和文化条件的制约，虽然不时出现强凌弱，大欺小国际冲突，一些庞大的帝国也曾横行世界，但其影响总是“日出”而现，“日落”即逝，强者、大者一旦衰落，其国际或曰世界影响也就随之而去。然而现代化的全球走向却改变了强国不可能全方位对弱国施以长久的、连锁性影响的历史。资本与技术的世界性崛起，使凭靠它们先行强大起来的发达国家，在世界格局的翘翘板上，相对于后来的发展中国家，总是站在沉的那一头。本来，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早期的殖民主义政策，使发展中国家在遭受长期的侵略与掠夺后，已丧失了大量资源和财富，元气久伤，失去了与世界文明同步进行的时机与基础。而二战后，当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时，发展中国家又由于科学技术的相对落后和国际贸易中受制于发达国家的被动状态，在现代化全球走向所必然导致的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中，始终处于国际经济利益分配格局中不利的一方。这样，似乎富国更富、穷国愈穷这样一种世界经济利益分配格局的极端不平衡状态，就成了近现代以来国际关系中的永恒。国际剥削的形式虽以暴力过渡为和平，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成员组成与利益角色，却从历史中延伸了下来，形成一种由历史到现实的连锁性反映。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1996 年在日内瓦公布的材料，截止当年，世界穷国与富国的差距仍在继续扩大。全球目前共有十亿多人口处于贫困状态，89 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日趋恶化。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兴起与知识经济的到来，国家这一最高社会层面所需要的人才资源，亦因发达国家由环境、教育等多种因素组合而成的生活质量和工作条件的优越，被源源不断吸引。据统计，仅六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就有 400 万工程技术人

员和医生流向发达国家,80、90年代的移居人员仍旧有增无减。这种势头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居高不下的留学热和移民热中着实可见一斑。这种财富和人才长期向发达国家倾斜的结果,自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的持续拉大。这就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同时会在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造成了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秩序。但是,正如已故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毛泽东主席所说的:“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基于历史上形成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而延伸下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各方面的严重失衡,彼此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在所难免的。尤其是发达国家中的超级大国。如美国 在前苏联解体后 愈发扶摇直上 以遍览天下无敌手的傲慢与实力,屡屡在世界事务中充当超级霸主的角色,今天插手海湾战争,明天轰炸南斯拉夫……为所欲为,霸气十足,越过联合国插手别国内政,垄断国际事务。这就给世界文明所需要的对各民族历史文化及现实要求予以尊重的国际关系准则,带来破坏性干扰,自然为希望独立自主寻求发展、以平等身份参与国际事务的弱国、小国所不容。战火也就时不时在局部地区以现代手段燃烧着。此外 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从自身的经济 政治利益出发,也不满于美国以“世界领袖”自居,^①企图独霸世界的做法。不同发达国家之间为掌握控制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主动权,明争暗斗,矛盾重重 同样危机四伏。当然 会不会有朝一日发展成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那样巨大的全球性灾难 不好断言。但是 动荡与不安的阴影 对本质上都需要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各国来说 终究是一种威胁。

如果说现代发展模式及其世界经济链条的牵拉带给现代人类社会以经济增长的麻烦的话 那么 与此相联系的利益分配不均的格局的延续,则同样是现代化在国际这一宏观层面带给人类社会

^① 1992年 在任美国总统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曾直言不讳地宣称:“美国已从西方世界的领袖变成世界领袖。”

的不安。

其三，普遍性的信仰危机和行为失范。作为宇宙间一种特殊的种属，人类不但拥有通过劳动创造有别于万物的物质生活的本性，而且还具有借助理想信仰的引导自我前进 确立完善的精神生活的本性。理想与信仰的产生 是人类在其生命形成后的漫长演化发展过程中，对人类的生命本质即与万物相区别的根据和生存意义不断作出追问和反思的结果，体现了人类对其自身存在和发展之意义和价值的终极关怀，也是对人类现实生存缺陷的主观弥补和超越。借助于理想和信仰 人类才能从一般生命本身所具有的客观缺陷和限制中超脱出来，从而为生命的存在和发展找到新的领域、秩序和方向。也就是说 理想和信仰是人类自我意识的一种高级表现形式 体现着人类本质需求而现实又尚难达到的一种真、善、美的境界。它以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柱和行动指南的面目而出现，构成人类精神生活重要而不可或缺的一环。正因为信仰体现了人类的本质需求和特性 故而 打从人类具备自我意识之后 任何社会便都有自己的理想和信仰系统，任何社会中的个人也都会选择自己的具体理想和信仰。尽管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 作为由时代精神和社会文明成果相互融汇产物的理想和信仰体系，其具体内容总是要打上时代的烙印，但它作为人类精神家园和社会秩序依托的本质功能不会改变。一个社会，如果出现理想和信仰缺失和偏离，就将充满迷惘和冲突，作为凝聚个体成为彼此依赖合作的群体，引导个体共同为群体生存而朝着某一可期望的前景持续努力的社会凝聚力和亲和力就会大为减弱。

在前现代 从世界范围来看 不同民族、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理想和信仰或许有变化 但其主流系统对社会的支配地位 却不曾出现实质上的大面积崩溃和瓦解。譬如 西方世界的基督教、亚洲的佛教、中国的儒学、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 乃至前苏联、东欧和当代中国的共产主义，都在不同时空的社会理想和信仰中占据支配地位，形成维系该信仰覆盖区或社会得以按一定秩序正常运转的

精神支柱和动力。但是以经济增长为第一目标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却使这种状况受到严重冲击。传统的理想和信仰体系在急速发展的物质文明面前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西方国家普遍出现被尼采称之为“上帝死了”的信仰危机，而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因面对社会转型困惑迷茫无所适从而出现的信仰空洞。

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之初，推动人们奋发进取的往往有两股力量，即韦伯所说的宗教推动力与经济冲动力。所谓宗教推动力乃指前已述及的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新教所倡导的这样一种精神——牟利生财是信徒的天职，凭着对上帝的虔诚百折不挠而功业成就者，才能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否则就是上帝的弃民。经济冲动力就是世俗功利的驱使。本来视牟利生财为至善的道德观念本身就与世俗功利紧紧纠缠在一起，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完成，财富的积累和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争取作上帝选民的新教伦理，便日渐退出人们的精神向往。而世俗的功利冲动、现实的荣华富贵则成了人们为之奋斗的惟一动力。当然，功利原则确实为西方的繁荣注入了强大活力，也证明了人超越上帝的挺拔的创造力，在这个意义上，尼采才说“上帝死了”。可是，在一个以挣钱致富为惟一目的、功利意识充斥一切的世界里，除了利益欲，追求物质享受之外，人们的精神世界会逐渐变得“穷得只剩下钱”。于是，往往感到生命的莫名空虚。加之市场竞争所带来的个体命运的变幻莫测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紧张与对立，技术世界所要求的视人如同机械般千篇一律的规范操作，也会使人感到处处身不由己。早期近代启蒙思想家曾庄严宣告并乐观地确信“人是目的”的理想，被工业化反而意味着人本身在工具理性膨胀的技术世界更趋失去主体性的现实所粉碎。另外，二战后，资本和金元帝国不可战胜的神话，又被当时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所震撼。于是，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其后的年青一代中，对他们所曾经信仰崇拜的与工业文明相伴生的价值理念，产生了深重的迷惘和怀疑。这样，在极度矛盾和失望的状况下，就出现了以

普遍的意义迷失、无信仰或信仰偏执为特征的精神坍塌现象，而且以所谓“文化反叛”、“垮掉的一代”、“嬉皮士”、“邪教”泛起为其具体表现形式。

“文化反叛”是西方世界于 20 世纪 50 年代出现的现象。参与者既有新富的工人家庭中的纨绔子弟，又包括一部分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他们不满于工业文明的急速发展所带来的高节奏、高竞争的异化和压力，而又无法从中摆脱，就通过一些极度偏离社会规范要求的行为和思想以示不屈。表面上对西方社会的现实提出了反思和革新的要求，本质上则是西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大不同步所造成的信仰缺失的后果。“垮掉的一代”是在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厌恶工业文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人的异化，反对垄断资本统治下西方社会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以克服异化、恢复人的尊严相号召。标榜“存在先于本质”即为了维护人的本性和尊严，应把非理性的具体的生存放在优先于一般理性本质的地位，以近乎中国魏晋玄学派放荡不羁的行为，作为个体存在、个人自由意志的实际体现。吸毒、酗酒、偷窃、同性恋...无所顾忌，以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态度来表示对现实社会及传统秩序的叛逆和抗争。表面上是追求本真的人性，获得个人的自由和解放，实际上是为反社会的极端个人利己主义披上了另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堂皇外衣。结果是使人从本质上更加丧失尊严，而且没有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只不过从另一侧面体现了西方社会的现实冲突和信仰危机。“嬉皮士”运动乃是当代西方社会信仰危机的典型表现。这帮人对现实的秩序规范及国家职能一概怀疑漠视，力图通过吸毒性满足甚至宗教魔法的虚幻境界，来体验所谓新的人生感受，以醉生梦死来逃避现实，反映出其内心无所适从的极度空虚和不安。与上述几种丧失理想信仰和人生航舵的普遍意义迷失不同，邪教不是以“放荡、逍遥”而是以新的“拯救”说教及与之相随的极端行为表现出来的心灵扭曲。宗教按其本质功能，乃是用神圣的方式来建造一种人类期待而现实又